

教师责任的伦理性与伦理规约*

■沈 璿 宋月辉

摘 要 对教师责任的伦理性质进行探究,实际上是追问教师责任究竟是何种责任。从本质上讲,教师行为应该是一种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由个人美德和责任能力共同决定的伦理责任行为,所以教师的伦理责任超越于其道德责任。教师责任的伦理性质就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审视教师行为的伦理内涵,将作为人性的善与恶通过建立具有伦理性质的教师行业制度和规约制度,对教师这一社会职业行为与特殊责任予以约束,以激发教师的“教育良知”,由“教化权力”转变为“同意权利”,实现制度伦理化的教育。

关键词 教师责任;伦理性质;伦理特征;伦理规约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0)10-0035-04

所谓责任,康德将其解释为“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1]。他认为,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合乎责任原则的行为虽不必善良,但违反责任原则的行为肯定都是恶邪。在古代,教师职业作为一种兼具“秀外”(即教育手段、教育技巧和教育风格)与“慧中”(即教育者的学术修养与道德精神)的特殊行业,必须“慎重师道”。而在文化和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教师作为变革的因素,在促进相互理解和宽容方面,其作用的重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容置疑。变革的迫切性赋予教师巨大的职责,因此,能不能成为真正人师的界分,就在于对教师责任内涵的理解、认同与担当。

一、教师责任的伦理性质

对教师责任的伦理性质探究,实际上是追问教师责任究竟是何种责任。将教师责任定位于职业责任,还需通过辨析教师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志业”为前提的,超乎职业责任之上的教师责任的伦理规定性。

(一)教师责任伦理性质的表象

1.从传统人伦观看教师责任的伦理性质

“道德随着践行道德的能者而发生变化。”(亚里士多德语)从教育组织与授业职能发生开始,教师的品性与授业行为的正当性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中国古代率先形成的“师道”概念,就包含了深刻的伦理意蕴。我国清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夫之在论证为师之道时已明确提出:“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之一……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2]这里已将教师的责任划入伦理范畴。教师责任是基于伦理之上产生的责任,是师生关系中的责任。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最基本

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其特殊性主要是“指师生在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交往和联系,既有工作关系、组织关系,也有心理关系、伦理关系”^[3]。“伦理”是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领悟和治理,这里既包含人与人已形成的某种客观关系,也包括通过人为地、有意识地调节所构成的特殊关系。也就是说,由于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人没有领悟到这种关系是什么,或对这种关系没有自觉意识,就不能认为已形成伦理关系,那只是存在而已,只是一种“自在”而非“自为”的关系。“教师的工作也不可堕落到光传授知识,还必须像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那样,有扎根于坚定信念的道。”小园国芳“有坚定信念的道”,就是一种明确意识“人之范,行之则”方可“乃为师”的教师伦理责任^[4]。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理念,罗马教育家昆体良“让教师首先唤起他个人对学生的父母般的情感”的思想,都是将师生关系比作血缘关系以凸显教师如父母般的特殊伦理责任。德国伟大的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更是尝试性地提出由伦理学决定教育目的,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活动涉及人格发展的全部,因此教育本身就带有伦理目的。他甚至曾经明确总结出把五种伦理规范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

2.从现代契约论看教师责任的伦理性质

教育社会学认为,教师承担着向学生施加符合社会要求的影响的责任,这一社会责任便意味着教师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社会将这些需要接受教育的成员交给教师,期待教师对他们施加符合社会要求的影响。所以,教师必须以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完成社会所赋予的这一任务,否则,其自身便得不到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9 年度课题《教师责任的伦理性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A880102)的成果之一,陕西省教育厅 2009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资助专项课题《建构陕西高校教师职业伦理制度研究》(项目编号:09JK153)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沈 璿(1967-),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伦理学研究;宋月辉(1984-),女,河北人,西安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伦理学研究。

社会的认可。因此,教师承担对学生施加符合社会要求的影响这一社会责任,是教师与社会之间的“契约”的产物^[5]。“契约”这种基于约定而产生责任的关系,是当今社会一种新的伦理关系。

基于“契约”这种社会约定,教师的品性与态度远比其他职业从业人员的品性与态度更容易受到公众关注。当教师的职业素质与社会期待存在距离或相去甚远时,便不能充当名副其实的社会代表者,也就不能很好地履行对学生进行个体社会化的社会责任。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应该要求教师比一般公民达到更高的标准和行为。所以,像教师这样的职业需要比其他行业对从业人员的个人行为有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合职业性的、合道德性的,更是合伦理性的。

(二)教师责任伦理性质的含义

传统职业观认为,职业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和个人生活需要,人们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社会职责的专门的业务和工作”^[6]。这种观点将职业行为解释为两种旨向:一种是相应于谋生的需要,职业行为关联的是利益交换;另一种是相应于事业成就,职业行为关联的是服务社会。这两种旨向都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一个人因为占据了一定的社会角色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要求。这种责任是职业责任,这种要求是职业要求。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职业生活为中心的时代,职业是“以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为前提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赖以进行基本社会活动的专门业务,以及因此人们对社会承担的特定职责”^[7]。这里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因谋生而产生的利益关系,还包括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和管理领域的各种人际关系,这里的“专门业务”,不仅指技术分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角色特征与社会职位,还包括真实自我与职业角色存在内在区分的可能,这里的“特定职责”,是指超越以内在德性为中心的传统职责,转化为以社会规则为中心的伦理职责。所以,现代社会的二重性(社会性、专门性)使得对从业者的要求不能只停留在“行业规范”中,还必须从个体道德领域过渡到社会伦理领域,从而形成责任的伦理性质。

教育历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在现代社会教育领域中,各种社会伦理关系又以教师为核心,因此对教师责任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既有的合法性和合情性上,还应从教师行为的“合理”——合伦理性上进行分析。教师责任的伦理性质就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审视教师行为的伦理内涵,将作为人性的善与恶(good or evil)通过对教师这一社会职业行为与特殊责任的分析与规约,在承认并满足教师合理利益需求的前提下,激发教师的“教育良知”,由“教化权力”转变为“同意权利”,教师以自己的特殊责任通过伦理规约处理与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可见,教师职业伦理就是出于教师特殊责任的伦理。

二、教师责任伦理性的特征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教师对学生的“生命”所能提供的帮助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得到关于技术的知识……其次,学会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还有,就是清明,……并且必须假定,身为教师本身已经清明。”根据韦伯的意思,“依据事理来管理”仅仅是“忠于职守的

义务”,“惟有将事务在主观上把自己与它联系,并以热情献身于此,方能称得上是一种‘志业’(Beruf)”^[8]。

(一)教师道德责任与伦理责任的区别

1.道德责任的个体性与伦理责任的群体性

道德责任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应该选择的道德行为以及对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其功能在于把所有道德固定在个体意识之中,这是他们的行为基础,其他一切均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另一种则是道德的特殊属性,即由于职业角色差别而对道德关系产生的影响,社会职业的差别构成了具有行业群体特殊性的伦理职责。这种差别性就使得“责任”这个概念有了不同的、更为具体的解释。可以说,有多少种不同的天职就有多少种道德形式。“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人都只能履行一种天职,于是,这些完全不同的道德形式便完全适合于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在每个社会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并行使的各种各样的责任,这种道德特殊性没有给个体道德留出任何地盘。”^[9]这时,个体性的“私德”已转变为社会性的“公德”。教育及其从业人员属于国家公共性质的群体,其社会作用与军队、政府相似,有责任杜绝任何性质严重的不恪守职业义务的行为。这也是教师的伦理责任超越于其道德责任的意义所在。

2.道德责任的单向性与伦理责任的多向性

道德责任的单向性就是指特定主体之间的单向责任,如传统教师责任观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说的是教师给学生传道、教师给学生授业以及教师解学生之惑,这种责任都是单向的。尽管后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双主体说也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来,但“双主体”更多指的是知识交流而非道德责任。美国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时,多次以“教育者的天职”、“教育者的责任”为专题提出教育者的责任。第一,对于知识应负的责任。教师不是把自己头脑中的知识搬出来教给学生就算了事,“必定要培养一种兴趣,对于学问上有很大的热忱,有继续研究的精神,时时在知识改造中”。第二,对于学生应负的责任。“做教育者,如能对于学生有一致进行共同利益的观念,视学生的进步就是自己的进步,那么,不但不以为苦恼,反而觉得很快乐了。”第三,对于社会应负的责任。教师“不但注意于学校以内,更应当注意于社会。不但做学校的教师,更应当做社会上一般人的教师、学生家属的教师”^[10]。对知识应负的责任、对学生应负的责任和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是杜威认为教师具有伦理性质“领袖的责任”的三要素。这种教师多向性责任的产生,就是基于教师职业的教育性、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和伦理性凝结而成的,这使得单向性的道德责任已经发展为调节职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应当,最终以伦理责任的形式表现出来。

3.道德责任的内化性与伦理责任的制度性

随着人的道德品性的不断成熟,在职业道德责任方面也渐次从他律走向内在化,这种转化随着人的社会良心的形成与德性的成熟,也就具有了职业方面的良心和德性。人们不仅不把对于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准则看成是外在的、客观的约束,而且还能在遵守职业角色的道德要求中获得自由,自觉地把握现存的职业道德准则,坚信通过履行这些准则才可获得自由,并且

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使现存的道德准则更加完备。然而,“人性需要规约”,尤其是制度的规约。人在社会之中生活,对于职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基本的制度构架安排。何种制度为“合理”性制度?当然有其技术性的要求与效率考量的要求,但根本上是伦理性的要求。所以,凭借所依据的伦理性要求而形成的制度就是具有伦理责任的制度,这就是精神性的价值理念通过其“物化”形态——伦理制度约束着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伦理制度就成为职业伦理责任的标杆。

(二)教师责任伦理的基本特征

从伦理学角度厘清教师责任伦理的基本特征,可以为社会评价教师责任搭建一个理性的制度平台,亦使教师得以洞悉自身责任的新的意蕴。

1.教师的伦理责任是道义责任

康德把职责分为正义职责和道义职责,主张想要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成为善良,就必须是为了责任而责任。对于责任的剖析,最为经典的莫过于他的“三个命题”:第一,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行为是否合乎责任,而在于它是否出于责任;第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他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他所被规定的准则;第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他认为道义职责是一种伦理的职责,是通过采取和实施赋予达到一定责任目的以分量的行动计划而完成的^[11]。根据康德的观点,需要深思这样几个问题:教师责任是“合乎”还是“出于”?其行为是出于“意图”还是“准则”?他们是否尊重教育规律而从事教育活动?事实上,现代社会要求教师的责任合伦理性,其行为要出于“准则”,要尊重教育规律而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据此,可以认为,教师责任既是一种与确定公共职位有着直接关联的政治性的职责承担,也是一种基于社会公共伦理精神和普遍伦理要求的道义承诺。这两个方面都是教师的道义责任应该承担的。

2.教师的伦理责任是客观责任

现代组织伦理学将责任伦理分为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美国行政伦理学专家特里·库帕认为,客观责任是来自于法律、组织以及社会对应于从事公共管理活动者的合理期待,属于一种外界控制。这种外界控制的主要形式就是伦理准则,它代表了通过组织和职业联系而施加在个人身上的价值观,与从外部强加的可能事物相关。客观责任具有两种形式:第一是职责,表现为对他人负责;第二是义务,表现为对事情负责。二者的关系为,义务是根本,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12]。客观责任侧重于伦理的宏观层面,其重点是基于人类天性所具有的被动性、反应性和顺从性,即人们应当服从规律和组织目标,个人行为应当为组织文化所左右。这种客观的伦理责任,可以帮助教师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面对面临的伦理问题提供解决困境的方式和方法。

3.教师的伦理责任是公共责任

美国一些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专家对公共责任的见解颇深。托马斯·R·戴伊教授认为,公共责任最基本的内涵是“在不

同个体之间就哪些行为能够为人接受以及行为者使用何种方式为其行为辩护达成共识”。杰克逊指出,公共责任一词意味着“对曾经做过、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情作出解释和辩护……在一方有权要求就其行为进行解释这一点上,可以说后者对前者负有责任”。凯登则强调,公共责任是“行为主体对其职责负责,他们受外界评判机构的控制并对其汇报、解释、说明原因、反映情况、承担义务和提供账目”^[13]。他认为公共责任有三层含义:在行为实施之前,公共责任是一种职责,负责任意味着具有高度的职责感和义务感,行为主体在行使权力之前就明确行使权力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行为实施过程中,公共责任表现为主动述职或自觉接受监督;在行为实施之后,公共责任是一种评判并对不当行为承担后果。

三、教师责任的伦理规约

责任的伦理规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所谓外在“必须”,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诉求与规范。就教师职业及其专业发展而言,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公共组织得以建立和维持的核心凝聚力就是建立具有伦理性质的行业制度,从而对教师责任进行伦理规约,并且,与以往关注制度的科学性有所不同,对教师责任伦理的研究应该着重于“通过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的道德追问来解释其内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14]。

(一)伦理规约的目的——秩序诉求

对秩序的诉求是儒学的重要价值目标。在社会生产高度发展和更大范围、更加细致的分工与协作出现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诉求实现或满足较之以往也就更多地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维系着的种种价值关系,亦更多地依赖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秩序。我国社会改革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已经导致了一系列教育伦理问题,如“乱收费”、“教育不公平”、“范跑跑事件”等。为此,教育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理论先行无论对于政府的政策选择还是对于社会的价值认同,都显得甚为重要。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有意识地建构教育的基本价值范式,并在这一价值范式的引导下,设计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政策和法律框架”^[15]。在社会生活中,当规范主导着交往,即当这种规范给行动提供了标准的解释模式时,社会才是现实的;同时,当规范被认可时,秩序也就稳定了。我国的教育领域与教师职业,不正急需这种伦理规约性的“规范”和“秩序”吗?正如中国明代王守仁所谓的“师严道尊,教乃可施”那样,我们需要通过建立一种蕴含着伦理精神的制度,尤其是对所建构的伦理制度的履行来实现今天的教师职业责任,这反映着公共社会对教师普遍合理正当之行为规范和教育教学生活秩序的共同愿望与要求。

(二)伦理规约的构成——内容要素

就责任概念的逻辑性而言,“它至少存在四位关联。职责意味着:(1)在某人那里;(2)针对某事;(3)面对某人;(4)按照某些评判标准的尺度而存在着。连追究和惩罚问题也发生在这四极张力关系中:谁为了什么在谁面前按照哪些标准承担责任?”^[16]伦理规约的构成也应着力于这四个要素。美国的NEA条例、日本的教师伦理纲要更加合乎这种内在逻辑性,中国台湾各高校更是制定了内容详尽的教师伦理守则。以台湾慈

济大学、高雄医学大学的《教师伦理守则》为例,具体包括了以基本信念为总纲的教学伦理、学术伦理、人际伦理、社会伦理等方面。而我国大陆“现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只有5条戒律,以戒律表示的规范,属于道德的底线……”所以,“近年来我国教师中发生的一些突出的涉德事件,如伊健庭解聘事件、‘范跑跑’事件、‘杨不管’事件等,当事人都曾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而一旦对当事人做出严格处理,当事人反而受到舆论同情,或许同我国师德规范较为含糊不无关系”^[17]。相比较而言,我国目前的教师道德规范的一些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并且涵盖的方面尚有疏漏,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从教师责任的伦理性及其伦理规约出发思考问题。

(三)伦理规约的实现——制度完善

我国“称之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文本中的条款,虽然条条都对,问题在于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道德的’规范,调节教师的职业行为”^[17]。而由谁来控制和影响教师教育、教师资格以及教师行为的规范性问题,是一个价值承载问题。教育伦理本身就体现为三个层面,即教育伦理价值、教育伦理规范和教育伦理秩序,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价值载体。在这三个层面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教育伦理的规范层面,因为它既是教育伦理价值的载体,也是实现教育伦理秩序的保障。今天对教育伦理规范的研究,不仅应设定教育者行为之“应然”,而且要昭明这种“应然”之内在的依据,并注重制度的整体建构与完善。如美国有教师行业自治组织,有联邦和各州的教师资格认证标准,还有教师伦理规范制度(professional ethics)以及对从业人员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规范要求(code of practice),当一位教师即使没有触犯法律,而违反了教师行业规范时,也会被开除。同时,美国在制定与教师相关的各种制度时,会综合考虑管理上的灵活性、专业上的可接受性、公众的支持性和经济上的可支付性。这就提示我们,对于教师责任的探究和规约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教育范畴的问题,它更多地要放大到社会的伦理关系中予以审视。

参考文献:

[1][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7.

- [2][清]王夫之.四书训义三十八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 [3]李国庆.教育学原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9-161.
- [4][日]小园国芳.小园国芳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5]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24.
- [6]李春秋.教育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1.
- [7]龚群.社会伦理十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5.
- [8][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3-185.
- [9][法]爱弥儿·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6.
- [10]单中惠,王凤玉.杜威在华教育演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430.
- [11][美]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讲义[M].张国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51.
- [12][美]特里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13]周志忍,陈庆云.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7-18.
- [14]钱焕琦.学校教育伦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
- [15]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1.
- [16][德]奥特弗利德·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M].邓安庆,朱更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5.
- [17]陈桂生.教师理论价值——规范体系刍议[J].中国教师,2008,(11).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部 陕西 西安 邮编 710048

Ethics and Ethical Statute of Teachers' Responsibilities

SHEN Xuan, SONG Yue-hu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Political Theory,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thical nature of teachers' responsibilities is, in fact, to question what the teachers' responsibilities are. In essence, teachers' behavior is a kind of ethic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which is based on their free will and decided by personal virtue, responsibility and ability, so teacher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exceeds their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the ethical nature of teachers' responsibilities is to review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teachers'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philosophy, to use the good and evil as the human nature to bi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behaviors and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system and statute system bearing the ethical nature,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teachers' "education conscience" to transform from "moralizing authority" to "approval right", thus realize the education of system ethics.

Key words: teachers' responsibilities; ethical nature; ethical features; ethical statute